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录了由中国书院研究中心、白鹿洞书院、七宝阁书院主办的第一届和第二届“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论坛”中的约30篇优秀会议论文。以“继承和发扬传统书院精神”为主题,不仅对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相关制度和精神进行了研究,还介绍了当代新型书院发展情况,并对现代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可以采取的措施等都进行了探讨。以古鉴今,书中所涉及的问题可以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论丛/马一弘主编.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667-0312-5

I. ①书… II. ①马… III. ①书院—中国—文集
IV. ①G649.2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7000号

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论丛

SHUYUAN CHUANTONG YU WEILAI FAZHAN LUNCONG

作 者: 马一弘 主编

责任编辑: 肖立生 蒋紫云 责任校对: 全 健 责任印制: 陈 燕
印 装: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32开 印张: 10.25 字数: 276千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7-0312-5/Z·11

定 价: 32.00元

出 版 人: 雷 鸣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822559(发行部), 88821594(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angziyun206@163.com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与发行部联系



书院：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邓洪波

书院是中国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著书、校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唐代初年，书院产生于民间，唐中期得到官方承认，经唐玄宗一代君臣“广学开书院”式的倡导，遂日渐流行。由唐而宋元明清，经千余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 7500 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明代开始，它又走向国门，传到东亚、东南亚各国，甚至欧美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交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 1901 年 9 月 14 日（农历八月初二）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教育的血脉。

今年恰逢书院改制 110 周年，回望书院——这一读书人的精神家园，谨作此文，以为纪念。

一、书院弦歌千年，历史悠久

书院产生于唐代，其起源有官、民两途。民间书院源出于读



【一弘七寶】

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论丛

六二

关，例如让学生重点学习义理，体验义理，而不是一味琢磨辞章训诂；设置考试内容时，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引导；在进士录取时，还可以拒斥那些功利心太强的人，如吕柟说：

予癸未在会试场，见一举子对道学策，欲将今之宗陆辨朱者，诛其人，焚其书，甚有合于问目。且经书论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则谓之曰：“观此人于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权势。”乃弃而不取^①。

儒学教育当然不可能跟科举制度抗衡，也不能确保科举制度的合理性，更不能确保谁能中进士、做状元；但它却可以将不符合儒学标准的人拒之于科举门外，而在政治较佳的情况下这样做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因此，想通过科举入仕者就不得不认真面对儒学教育。

第三个是围绕政治的儒学舆论阵地。在君主制度下，官员的权力很大，儒学不得在不维护君主政治的同时，又以最严厉的方式反对官员以权谋私，这当然是一种矛盾。而如何保证儒学思想在现任官员身上发挥作用，这也是一个难题。因为从教育、科举到评议官员，儒学的实际作用力越来越小，天理的折扣也越打越多。但是，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存在，却催生了一个对官员形成较大压力的舆论阵地。如《泾野先生语录》记载：

昔者闻有一金事求见王贛庵公云：“西来一件为黄河，二件为华山，三件为见先生。”王公云：“若做官不好，纵见此三者，亦不济事。”

有一名公曰：“近日对某讲学者，惟少某人耳。”先生笑曰：“程子说韩持国曰：‘公当求人，倒教人来求公耶？’若为这道讲，须下人去讲，不然，有道者他肯来寻公讲耶？”又曰：“某尸位未尝建得事业。”先生曰：“不然，贤人君子在位，不必拘拘如何是建功创业，但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八《河东学案》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4页。



一弘七寶

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论丛

七八

效国家为大任的教育思想。

国学乃一国之学问，国学讲的是一个国家国人之精神。礼义廉耻、忠孝节义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道德教养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素质培养；校园风气养成，乃社会风气之楷模，风气，乃人与人的自然关系，是社会和谐之本；此三点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教育之根。精神教育需要发扬，知识教育需要传承，所以我们要传承儒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书院是实现教育的地方，是追寻教育之根教育之本的地方，而非普及文化的地方。

关于教学用的经学问题，基础教育大多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儒家经学应以儒家原典为根本。儒家原典的教育即孔子删述的六经和教授的六艺，是孔子根据他之前一两千年的历史而确立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建立的儒家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托以尧、舜之德而立，尧舜之德乃以民为本，是真正的民本主义。今日之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以民为本，所以回归儒家原典教育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儒家原典价值体系以六经为主要经典，这些经典因人们的学习一代一代真实地传承下去。儒家原典文化是一个以人类脱离天然的动物性而向着普遍的人性提升的历史过程为依据，以原始氏族向私有制转化过程中形成的宗族血缘关系为文化基因建立起来的经典。儒家经典不是宗教经典，宗教经典是一种神学体系，儒家经典是依托历史文献的人文体系。通过对童蒙进行儒家原典的教育，使之长大后形成以仁爱、秩序、和谐为价值取向的道德观。人们通过对经典学习而形成价值信仰，一个有道德信仰的人，做人做事就会有底线，就会有所顾忌，就不会胡作非为。

孝悌、礼乐是实现原典教育的核心。宗族以血缘相连，以孝悌、礼乐来维系宗族间的和谐生存。人是高级有情动物，情志教育通过孝悌完成，通过礼乐调理人的情感世界，最终使人与人的关系达到仁爱、秩序、和谐，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

学习科学知识应以报效国家为根本。国家的先进科技力量是国家和民族的底气，一个充满底气的民族，国民才有自信。





鹰捉小鸡、捉迷藏、跳皮筋，都是小伙伴们共同玩耍的游戏，其最大特点就是通过游戏可以增进孩子之间的感情；

9. 中国文化的语境氛围还体现在孩子从小要守“家规”“家教”，良好的家教是中国家庭文化的体现。《朱子家训》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内外整洁”就是最好的家教氛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内外整洁”言虽短可意义非常，它告诉人们从小就要做事，做事要勤快，且从最小事做起，做事有终有始。

10. 中国文化的语境氛围还包括应对、进退及待人接物的礼节。

中国文化教育语境就是圣人讲的小学的重点即讲习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的具体行为，即所谓“学其事”或“事教”，以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

陶行知先生也提出，人品教育端赖于6岁之前的培养，凡人生之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儿时期立一适当基础。

四、童蒙与儿童、少年教育

教育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必然分为童蒙教育（启蒙教育为0～3岁，童蒙教育为4～7岁）和儿童、少年教育（8～18岁），两者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评体系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书院也将教育分为童蒙教育和儿童、少年教育两大部分，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评体系和今日国立学校也有很大区别，其显著特点是书院学生少（10～100人），班级小（9～12人），师生关系是师徒关系，注重孩子的多方面能力培养，以自学和启发教学为主要教学方法，强调知行合一的教育；教学内容分人伦道德与人品教育、国学教育、语言教育、自然科学教育、武术与体育运动教育、中医文化教育；童蒙考评体系更加强调人品与行为习惯的考评，强调指示明确、单项的考评，如劳动、诚实、谦让、认真、礼仪、服从命令、文雅淑女、男子汉阳刚之气、手工、围棋、象棋、书法、歌唱与表演等。



《一弘七寶》

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论丛

一一三



点，即全心全意地为了每一个人自身人格的健全、自我的完善、个性的独立、价值的实现这一目标。这将是中国社会人心回归正途的重要起点。这才是对人真正的关心和爱，真心实意地为千千万万人的自我完善和人生价值服务，而不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来推动道德建设。如能这样做，一定会激发出无穷无尽的人心潜力，将其化为长久不息的道德资源，成为整合社会秩序、收拾世道人心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一个致命的误区是认为，让人们“各遂其性”，将导致天下大乱。这种观点的致命之处是把“各遂其性”当作自由主义、利己主义。殊不知，儒家尽性立命的思想是让人们学会正确认识什么是真正符合自己人性的东西；儒家认为，一旦人性回归于正常而不是扭曲、健康而不是邪恶的状态，自然会捍卫人间的正义和社会的秩序。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尽心上》）“知其性”就是唤醒了心中的良知，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由萌动至闪耀。这是人间一切道义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是一切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最强大基础。

另一个致命的误区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在于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能接受统一领导。这种观点建立在这样一种理想化的假定之上，即人的思想可以用人为的方式来塑造和统一，不管其自身的规律如何，通过无数次灌输某种有利于集体利益的思想，可以把所有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使所有人的行为趋于一致。这是一种非常主观、想当然的错误观点，是在政治决定一切的思想前提下想出来的。它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这种做法违背了人性自身的逻辑。也就是说，人性有它自身的本质特征，不是谁想要塑造就能塑造得了的；而道德教育也有它自身的规律，不是可以人为地、想当然地用灌输方式来强加于人的。前面我们说过，人性受制于文化的心理结构，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决定了中国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人，才能保证其人性不被扭曲；不尊重文化习性的逻辑，只会使人性被扭曲，人心被撕裂，而不能建设社会秩序和道德。



度的畏惧，而不是高压下的服从。并进一步督促教师家访制度的有效落实，使得学校、家长、学生之间建立一种良性透明的互动关系。同时，教师也要深入钻研教材、教法，分析并掌握学生特点，尽可能地“因材施教”，注重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尽可能地消除代沟。

其次，建议将适度的体罚写入《教育法》。“棍棒底下出孝子”式的教育方法是我所反对的，但“从不动孩子一个指头”式的教育理念更是我所反对的。孩子毕竟心智未全，缺乏足够的自我控制能力，需要父母和老师及时教育和引导。常态下只要说服教育就够了，但是当孩子出现严重的性格问题甚至道德问题时，必须予以相应的惩戒，才能够让他充分认识到这样做和平时所犯的错误有质的区别，便容易让孩子清楚道德的底线在哪里，从而培养孩子的道德意识和敬畏心理。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样也是当代人尤其是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人很难接受的观点。但我们只要看看我们的邻国——韩国、日本在学生教育以及国民道德养成方面的做法和成就，至少应该深思一下。

为什么韩国的《教育法》不厌其烦地将体罚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什么即使留学美国多年的韩国人对《教育法》中这种“粗暴”的规定也没有提出异议，甚至还持赞成态度？为什么韩国人在西方化的同时，还有那么多人对传统充满热爱，甚至赞美？

同样我们也应该深思为什么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中，对体罚从未做绝对的禁止，这不是一句“古代缺乏平等观念，不重视个人权利”就能解释得了。但这涉及的就更广了，不再深入。

再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教师应该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身教胜于言传，古人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教师的作用一如父母，在家里也讲“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一个紧密而不可分的整体。教师如果有孝心，尽孝道，并将其外化为对学生的爱，并引导得法，师生关系必然改善，学校和家庭必然产生良性的互动。除了极个别的特例，一般的家长都会配合老师、学





理水平日益提高，因而逐步增设了许多专门的管理职事。这与书院制度发展得更成熟有关。与各地书院大致相同，嵩阳书院的主要职事有山长、堂长、讲书、经长、斋长等。

山长或称院长、洞主，其职责是主持书院的教学和负责行政管理。因嵩阳书院创建于嵩岳太室山麓的丛林之中，故主持者被称为“山长”，代代因循遂成传统。北宋以后，山长正式成为管理嵩阳书院的学职，并且一直沿用下来。清乾隆时期统治者曾规定一律改称“院长”，但人们习惯上仍称山长。由于山长直接决定书院的声望、人才培养等诸多社会因素，因而凡任嵩阳书院山长者，均为学识渊博且有一定声望的人。堂长是从嵩阳书院生徒中选任的，主要负责督课考勤、课堂记录、搜集诸生中的疑难问题等。讲书原为学官名，后嵩阳书院沿用，主要负责嵩阳书院经书讲解。经长由山长从生徒中选出的精熟经籍者担任，负责为生徒解析疑义。“凡学徒有疑义，先求开示于经、学者，不能决，再叩堂长。”而斋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他一般由山长在诸生优秀者中选出，协助山长从事嵩阳书院的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

另外，还有掌书、掌祠、首士，以及火夫、更夫、堂夫等若干工役人员。这些完备的人员设置对嵩阳书院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所经历千年兴衰的书院中，人员以及相关职务的固定很好地促进了书院优良传统的保持与优化，他们为书院代代传承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二）讲学的内容与制度

嵩阳书院自五代、北宋至清代是以讲理学、经学为主。其教材主要是四书五经。其实，由于处于封建时代，书院教学受到科考的很大影响。教学方法主要是讲课的方式，由老师先讲，然后再进行讨论。在耿介所制定的《辅仁会约》中记载了一些教学制度，对我们认识嵩阳书院的教学特点有帮助。《嵩阳书院记》中说：“定辅仁会约，集诸生，每月初三日课文，十八日讲学，寒暑风雨不辍，诚今之鹅湖白鹿洞也。”在嵩阳书院，历代都有名



弘七寶

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论丛

一七〇

仙山、千年古镇河口镇、千首词圣辛弃疾、千古名臣费宏、千篇华章蒋士铨、千年纸都石塘镇，为以鹅湖书院为核心的国学文化产业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支撑。鹅湖之地，历来是富庶安宁之乡，晚唐诗人王驾有诗记：“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诗中把这种农耕富足、民风安逸的南方鱼米之乡的闲情逸致刻画得细致入微。安康闲舒的生活为思辨文化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睿智斯文的理学大师也选择了灵杰之地。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约朱熹、陈亮再会鹅湖，朱熹因故未到，而辛、陈二人“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乃别”。这样一段史实把鹅湖书院、峰顶禅寺、观音寺、瓢泉、辛弃疾墓等全部联系在一起了，成为中国罕见的名人、名事、名学的文化景观。

鹅湖胜迹，名闻天下，古往今来，吸引了不少诗人墨客、一代名流前来寻踪探胜。唐代王驾、宋代的陆游、明代的杨廷麟、清代的李光地等，都曾有鹅湖之行，并留下了他们的文词和诗篇。

在现在的江西省铅山县有一古寺，寺虽不大，貌也不惊人，但却因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寓居于此，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也发生在此地，而成为中国儒学圣地、理学祖庭。鹅湖之会首开了书院会讲先河，使中国学术界整整兴奋了 800 多年。这次论辩最直接的成果是导致了一座书院的诞生。

走进鹅湖书院，无论是从视觉艺术的感染力，还是从文化内蓄的震撼力，最动人心的是耸立在书院头门内泮池前的书院牌坊。这不仅仅是因为鹅湖书院是“最具原生态的中国古代文化书院”，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不仅仅是因为鹅湖书院牌坊是全国仅存的唯一全石质牌楼式中国古代书院牌坊，是中国文化建筑作品的精品；更因为鹅湖书院牌坊是融中国儒文化和雕刻艺术于一体的书院教育标志性建筑，是中国正统文化——程朱儒学的标志。

前不久，北京大学正式认定鹅湖书院为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文





然此学制恐难以切实施行。东汉时，唯有司隶校尉下设假佐二十五人，中有“孝经师主监试经”^①。外十二州，每乡置三老，主教化^②而已。可见，即便到了儒学更加兴盛的东汉，也难以保证每乡配备孝经师一人。

至唐，我国传统学制完全定型。唐制如下：

国子学，生三百人……太学，生五百人……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③

国子学至算学都属于国家级的教育机构，其余则属于地方学。很显然，行政级别越高生员人数越多，而县学、州学、府学间并无递进性的等级关系。这种学制格局一直延续到清末。前者与学术资源分布不均有关，后者与传统学术自身特性相关。东汉末年，太学常有三万人之众。一方面反映了学术的发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术资源（主要是书籍、经师）的分布极不均衡：郡国学不发达，帝都独盛。后代郡国学虽渐发展起来，毕竟学额有限。因此汉唐时承载教育功能的主要还是私人讲学^④。仅以东汉为例，史载大儒门徒往往千余人乃至数千人。如魏应“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丁恭“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⑤

（二）私学的演化：从私人讲学到书院讲学

私人讲学的形式为经学大师凝聚门下弟子前来就学，故《曲

① 《后汉书·百官志四》。

② 《后汉书·百官志五》。

③ 《新唐书·选举志》。

④ 这里专指书院发生前的私学。书院也基本属于私学，但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文中称为书院讲学或书院。由于蒙学是一种基础教育，无学术孳生能力，故不在此处讨论的私学范畴之内。

⑤ 《后汉书·儒林传》。



展的新方向^①。21 世纪初以来，黄玉顺通过儒学与现象学的对比理解，逐渐形成其“生活儒学”的系统思想，他认为“面向生活的儒学已经成为一种儒学复兴的基本趋向”^②。我们可以认为，当代儒学的生活化转向已经是一股明确而强劲的思想潮流。

在这股儒学生活化思潮中，并非所有的学者都着眼于解决儒学如何落实于现实生活的问题。比如，黄玉顺所说的儒学要回归生活，更多的是从儒学的理论建构来说的，即儒学要实现思想理论上的突破就要回归生活。当然，这种理论上的创新首先要成功地回答现实生活的问题，因此，儒学面向生活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儒学向现实生活落实的一个思想基础。但是这些思想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我们主要来介绍当代学者如何处理儒学现实影响力的困境问题。

80 年代后期，余英时提出儒学“游魂说”的同时，也提出了解决此困境的课题：

现在的问题是：现代儒学是否将改变其传统的“践履”性格而止于一种论说呢？还是继续以往的传统，在“人伦日用”中发挥规范的作用呢？如属于前者，则儒学便是以“游魂”为其现代命运；如属后者，则怎样在儒家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联系，将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③

余英时最终不能接受儒学退居学院的结局，但是他也不认为儒家能够再回到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地位了。因为儒学已经不可能再重新建制化，而全面安排秩序则非建制化不为功^④。现代社会不能重新在儒家价值和社会结构之间建立制度性的联系，那么

① 李承贵：《生活儒学：当代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8 期。

②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53 页。

③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67 页。

④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79 页。



一、复性书院的尴尬

所谓尴尬，就是处于两难境地无法摆脱。复性书院从其时代背景、理念萌生到创建过程乃至运行始终，一直处在尴尬的境地中。本文试就历史背景、当时的教育体制与复性书院的具体架构诸方面，简略地分析一下复性书院的尴尬所在以及这种尴尬的影响所及。

（一）复性书院历史背景的尴尬

我们首先有必要从当时中国的大局来谈。当时中国的大局是什么？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即是。这一变局从清朝同光年间就已开始，至复性书院寿终正寝，仍远未结束。在整个大变局中，“中国社会构造崩溃，以致几十年来整个社会向下沉沦，一切事业失败是常情，成功是例外”^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方方面面的矛盾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令人焦头烂额；五花八门的救亡图存的呐喊与方案，更是互不信任，互相争吵，互相攻击。中国陷入了空前未有的尴尬局面。这就是模仿、追趋西洋而“屡试无效，愈弄愈糟”，想回去固守传统又根本回不去的尴尬。这一总尴尬又可以分别从三个维度来理解：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实际存在的特殊价值和深远影响力缺乏合情合理的认识与承认，而一味地反抗厌弃；二是对西洋近代思想的趋之若鹜，而画虎不成反类犬；三是渴望跟上反西洋近代潮流的新潮流，而又未能跟上。造成这些尴尬的根本原因，是对于中西文明的根本精神及其无法调和的矛盾性缺乏透彻通达的认识。

人类进入20世纪，世界文化都处在大变革的历史关头，不独中国在变，西方社会也在变。这时，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只是一个自救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问题。因为

^①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页。



习惯变成凝聚坚固、整齐团结的新气象；而后战时可以制胜，战后可以建国。”^①这篇训词，诚如刘继青博士所言，“确立了战时教育政策的基调”，这个基调与马一浮先生提出的“不隶属现行学制之内”的三原则明显抵牾。

1938年6月1日，教育部公布《私立讲学机关设立办法》，全文如下：

第一条 书院及类似书院之私人教学机关，应具备下列条件，方得设立：

一、主持人在学术上有特殊贡献，资望品格为海内所崇仰者。

二、不违背三民主义者。

三、经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投票通过者。

四、学生须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五、有充足之基金者。

第二条 私人讲学机关之学生概不给予资格。

第三条 私人讲学机关遇有特殊情形必需政府补助经费时，应遵照私立专科学校补助费支給办法呈请。

第四条 私人讲学机关，每年须将该机关状况呈报教育部，其应报之项目由教育部订定之。

第五条 私人讲学机关成绩优良愿改为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者，得按照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立案手续，请求立案并改称。

第六条 私立讲学机关设立后，本部将随时派员视察。其有违犯规范者，即予以取缔。^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办法》正是在复性书院创办的过程中发布的。如果将它同马一浮先生起草的《复性书院简章》进行比

^①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总第83页，转引自刘继青：《复兴书院论》，博士论文未刊稿，第47页。

^② 转引自刘继青：《复兴书院论》，博士论文未刊稿，第47～48页。



他就极具谶语意味地说：“当此危难之时而建此议，真如梁元帝在江陵围城中诏百官戎服听讲《老子》，陆秀夫在崖山舟中讲《大学》矣。”^① 复性书院的艰难曲折与不死不活的尴尬命运不过这一矛盾的表现而已。

二、复性书院的启示

复性书院苦苦撑持了十年，至1948年秋宣告停办。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书院亦绝迹于中国大陆。七十多年后，书院竟能再度兴起，此中大有事理值得研究。这里仅就复性书院的历史启示，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中西文化矛盾是书院命运的幕后推手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最后结论中说：“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理性无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必明乎理性在人类生命中之位置，及其将如何渐次以得开发，而后乃于人类文化发展之全部历程，庶得有所见。又必明乎中国之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而后于此文化不可解之谜乃无复疑滞，并洞见其利病得失之所在。所有中国文化之许多特征（如上所举乃至上所未举者），其实不外一‘文化早熟’之总特征。这是从上论证到此，毫不含糊的结论。”^② 不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之所在，便没法正确理解书院的近现代命运。复性书院的重重尴尬，莫不与中国人激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仿效西洋的急躁与盲目相表里。“而抛开自家固有精神，向外逐求自家前途，则实为一向的大错误，无能外之者。所谓‘屡试无效，愈弄愈糟’者，其病正坐此。”^③

① 马一浮：《致寿毅成》，《马一浮集》第一册，《濠上杂著》二集之“寒江雁影录”，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③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



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名胜之地演变成名教之地。这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古代书院遗存的魅力。

书院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是传统文化的血脉，是古代读书人进行思想理念与文化的交流的重要场所，它不仅是教育中心，也是学术研究中心。古代书院办学的目的与方法、学田的管理与使用、山长经师的选聘、课程的设置、藏书的功能以及学生的培养都有其独到之处。书院的一些优良传统为现代教育提供了借鉴，值得继续传承发扬。正如国学大师季羨林在《中国书院辞典》序言中所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流行了1000年的书院这种古老的办学形式，在今天还有其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这个形式，加入新的内容，使它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笔者认为古代书院可以为现代教育提供如下借鉴和启示：

（一）倡导学以致用的学风

古代书院教育不直接与科举挂钩，是它的特色和进步。不挂钩，少了许多功利，断了许多出仕的机会，剩下的只能是读书、修身、做学问了。以白鹿洞书院为例，直到晚明万历年间，才由白鹿洞主李应升向朝廷申请到科举名额。

书院教育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和一般的教育职能，如传授知识、陶冶情操、净化灵魂、敦风化俗等。学生在院来去自由，学习期限亦无硬性要求，学生学习只给学习证明，不发毕业证书。学习证明与科举入仕并无联系。学生在院以自学为主，辅导次之，留有更多自我发展、自由选择的空间。诸生质疑问难，经师释疑解惑。诸生所提各条，山长经师集中时间统一作答。老师不仅为经师，更为人师，中空先生、南郭先生在这里是难以为继的。著名书院还结合实际，学习“六艺”，设有射圃、跑马场等，方便生徒学习射箭、骑术等。亦有既学文又习武，既讲文事又讲武备的书院，如明代嘉靖时江西九江肄武书院、清代康熙年间福建漳南书院，均列教育为强国第一要务，以培养负荷担道、扶危





案，留日学生汪某浦东机场刺母案，江西九江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杀死正院长案等等，均为高智商、高学历犯罪。它以事实表明：无文化不可怕，有文化无道德最可怕。相比之下，吴敬梓笔下的范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真可谓小巫见大巫，自叹不如。

人，尤其是青年学子，可以没有知识，没有本事，却绝对不能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没有健全的人格品行，没有敬畏的法律常识。没有知识、本事，可以从头开始，反之则只有遗憾与悔恨。

（四）倡导爱国爱乡的精神

朱子是个稳健的爱国者，早年力主抗金，上书言战，也曾担任过武职。后见朝廷腐败，中兴无望，才力主守势安内。江万里是其二传弟子，文天祥是其三传弟子，均成为宋末民族英雄。从朱熹、江万里到文天祥，从白鹿洞到白鹭洲，确有一条爱国主义红线贯穿其中。故江西已故史学家姚公骞有联赞曰：“事业铸千秋，白鹿导前迎白鹭；忠贞搏万里，丹楹启后育丹心。”朱子先振兴白鹿洞书院，订立朱子教条，要学子忠于君王、忠于国家，后来去了岳麓书院，刊刻“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于讲堂内。

东林书院为晚明时天下著名的书院，弘扬爱国精神是其办学主旨，史书称“东林之学源于薛”。薛指薛应旗，嘉靖年间为白鹿洞主，后为顾宪成、高攀龙的老师，对东林学派形成有很大影响，故有“东林发轫于白鹿”之说。再则东林书院的重建者邵宝，也与白鹿洞渊源深厚。为举子时，先建东林书院于无锡城南。中进士后，调任江西提学，重振文教，继兴绝学，因有功于洞，奉祀先贤祠。东林书院开创的讲学和议政相结合的学风在历史上也有积极意义。

从书院走出的爱国英雄大有人在，江西叠山书院，是为纪念民族英雄谢枋得而建，革命先烈方志敏少年时即读书其中。

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等社会大变革中，书院山长及生徒起兵抗争，不屈被杀者不胜枚举。屡征不应，归隐林泉者更是大有人在。



以嵩阳书院为例，北宋画家李唐，早年游学其间，后作《采薇图》、《晋文公复国图》以警世人，盼收复中原，驱逐金寇。进士付察，亦是嵩阳学子，被金人俘虏后，不屈而死。

而岳麓书院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更是有口皆碑，沿袭漫长。山长张栻，出身抗金名将之家，屡次上书，誓不言和，也曾效命疆场，上了前线。《宋元学案》中所记该院学生 33 人，在抵御侵略时均有出色表现。元军兵困长沙时，学生因战“死者无数”，表现出英勇不屈的浩然正气。明末时，山长吴道行、郭金台及学生王夫之等结成爱国保家的人才群体。从近代开始，岳麓书院发展进入黄金期，尤以培养造就经天纬地人才，高举反帝爱国、救亡图存大旗而闻名于世。启蒙思想家魏源，封疆大吏陶澍，军事家左宗棠，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派首领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或执教其中，或求学于内，并影响到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维汉、萧三、张昆弟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共早期领导人。由此可见，说古代书院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源远流长，一脉相传，一点也不为过。

此外，朱熹倡导乐山爱水，主张学习读书要到大自然中去，认为许多问答、语录都是在云松下进行，在林泉间完成的。王守仁则提倡要心身愉快地读书，载歌载舞地学习。在书院中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尊师重教、爱生如子蔚成风气，以书院为乐园，事师长如父母，也为后人所称道。受到东林学风影响熏陶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至老尚能背诵《古文观止》的大部分篇章。他回忆往事，曾深情地说：“这得益于少年时的童子功。”以上这些对于新创办的书院恐怕也不无裨益吧。

诚然，古代书院教育也与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一样，存在的弊端是很多的，为历史所淘汰也是必然的。这主要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体制机制的问题、教材的问题、方法的问题。这是当代书院的开创者和古代书院的研究者必须明确的。

1. 社会制度